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聲請書

聲 請 人 王瑞豐

訴訟代理人 邱顯智律師 設台中市自由路一段 106 號 4 樓之 5

(附委任狀)

電話: 04-22201376

聲請人王瑞豐因搶奪財物案件，經國防部南部地方軍事法院 89 年判字第 074 號判決判處有罪在案，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再經國防部高等軍事法院高雄分院 90 年高判字第 015 號判決判處五年有期徒刑，聲請人再提起上訴，最後經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0 年度軍上字第 10 號判決駁回確定。茲依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8 條第 1 項等規定，就上開確定判決所適用之軍事審判法，聲請解釋憲法暨大法官釋字第 436 號解釋之補充解釋，並敘明聲請意旨暨相關事項如下：

壹、本案事實及判決經過

- 一、聲請人王瑞豐與陳俊龍，被控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八十六年五月十八日下午九時二十分許，由王瑞豐騎乘屬所有之車牌號碼
重型機車，後載陳俊龍，在高雄縣鳳山市瑞竹路五十號前，
自後尾隨在前由洪黃麗更騎乘，後載其女洪偉萍之機車，趁洪黃麗更不
及注意之際，自洪黃麗更左側，由陳俊龍出手搶奪洪黃麗更所有置放於機
車前置物籃內之黑色皮包一個（內有新臺幣約六千元及身分證、銀行存
摺、提款卡、駕駛執照、行車執照與項鍊等物），得手後，共乘機車逃逸，
洪黃麗更則駕車自後追趕並記下該所騎乘之機車，係為綠色，號碼則為

。因認聲請人王瑞豐與訴外人陳俊龍涉有刑法第三百二十五條第一項之普通奪罪嫌。

- 二、因王瑞豐當時為現役軍人，陳俊龍為民人，故雖然本案事實為共乘一輛機車搶奪，兩人分別適用軍法審判與普通法院審判，判決結果王瑞豐被軍事法院判處五年有期徒刑確定，入監服刑(附件一)；陳俊龍則獲判處無罪，最後更二審無罪定讞確定(附件二)。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於陳俊龍更二審判決理由明白指出：

「綜上所述，因搶案僅一、二秒之際發生，告訴人洪黃麗更僅看見搶犯之側面及背影，並未看見正面，另一歹徒根本未看見，也一併在警訊中指認，其指認尚不嚴謹，且證人洪偉萍也稱警詢時伊不敢指認。又告訴人洪黃麗更所指記車牌地點與證人洪偉萍所述不同，被搶地點至記車牌地點均有距離，當時復屬人車穿梭不絕之際，三人共騎一車追趕搶匪，乃有誤跟而與他車混淆錯誤之虞，是其記下之車號也不能排除錯誤之可能。況且被告與王瑞豐案發後十分鐘即前往理髮，亦在該區騎車，非無因此遭告訴人誤跟誤認之虞。此外，復查無其他確切證據證明上訴人陳俊龍有本件搶奪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陳俊龍犯罪，原審未查而為此部分科刑之判決，尚有未洽。被告陳俊龍上訴意旨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撤銷原判決，另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該判決論證嚴謹，謹守無罪推定原則，未因告訴人之不嚴謹指認而入陳俊龍於罪，可謂當代法治國

家審判獨立、以證據論斷事實之最佳體現。

三、然聲請人因軍人身分，遭國防部高等軍事法院以軍法審判，判處五年確定，其理由乃以：

「上訴人王瑞豐與陳俊龍於搶奪財物得手後，非立即遭逮捕，距二人到案之期間內，尚至欣欣理髮店理髮及陳員騎機車載上訴人返家後，始先後到案，以渠等均久居該地區，及所搶得之財物皮包乙個、新台幣六千元、身分證、銀行存摺、提款卡、駕駛執照與項鍊等物自可方便藏匿、丟棄甚或交付他人等方式迅速處理，雖查無贓證，仍無法證明其未犯罪，……縱見搶嫌有偏過頭擷取財物，因事出突然，是否於此剎那間即可記憶其長相，亦非屬肯定，是被害人就看見陳俊龍長相雖前後供述不一，非謂其依背影、衣著、髮型指認陳俊龍等情，均不可採信…」

四、由上可知，何以同一犯罪事實，一人適用軍法判有罪，適用普通法院程序卻判無罪，蓋於本案中，軍事法院審判官乃係以先推定有罪，再由被告舉證證明其未犯罪之方式，論斷其刑責；反之，普通法院法官係以如無證據證明有罪，則應推定被告無罪。軍事法院法官此一大開法治國倒車之做法，導致聲請人白白冤枉入監服刑，不僅聲譽受損，更白白浪費寶貴青春，其間之委屈，非筆墨能以形容。

五、惟何以軍事法院法官會做出如此荒謬(雖查無贓證，仍無法證明其未犯罪?)、違法違憲之判決？實乃我國軍事審判制度為一上命下從，審判不獨

立、審檢不分立之制度。該制度之存在，可謂即為冤錯案之根源，空有法院之名，實則為不折不扣之行政機關(隸屬國防部軍法司)，雖經鈞院大法官釋字第 436 號解釋宣告諸多違憲之處，惟目前仍有多處違憲之處，以下分述之。

貳、聲請大法官解釋之理由

一、原確定判決所適用之軍事審判法第 181 條第 5 項之規定，抵觸憲法第 7 條平等權，應違憲。

(一)依鈞院大法官釋字第 436 號解釋：

「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憲法第十六條並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現役軍人亦為人民，自應同受上開規定之保障。又憲法第九條規定：「人民除現役軍人外，不受軍事審判」，乃因現役軍人負有保衛國家之特別義務，基於國家安全與軍事需要，對其犯罪行為得設軍事審判之特別訴訟程序，非謂軍事審判機關對於軍人之犯罪有專屬之審判權。至軍事審判之建制，憲法未設明文規定，雖得以法律定之，惟軍事審判機關所行使者，亦屬國家刑罰權之一種，其發動與運作，必須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最低要求，包括獨立、公正之審判機關與程序，並不得違背憲法第七十七條、第八十條等有關司法權建制之憲政原理；規定軍事審判程序之法律涉及軍人權利之限制者，亦應遵守憲法第

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本於憲法保障人身自由、人民訴訟權利及第七十七條之意旨，在平時經終審軍事審判機關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案件，應許被告直接向普通法院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請求救濟。軍事審判法第十一條，第一百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一百五十八條及其他不許被告逕向普通法院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請求救濟部分，均與上開憲法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 滿二年時失其效力。

(二)惟查，於上開解釋公布後，軍事審判法雖經大幅度修法，惟仍維持歷來檢察不分立、審判不獨立之傳統，例如，軍事審判法：

第十五條（地區軍事法院之設置原則）：國防部視部隊任務之需要，於適當地區設地方軍事法院或其分院。戰時得授權地方軍事法院，於特定部隊設臨時法庭。

第十六條（高等軍事法院之設置原則）：國防部視部隊任務之需要，於適當地區設高等軍事法院或其分院。戰時得授權高等軍事法院，於作戰區設臨時法庭。

第四十九條（軍事檢察署之設置）國防部於各級軍事法院及分院各配置檢察署。

依上開條文所示，軍事法院及軍事檢察署均轄於國防部下，檢察不分立，檢察官制度所依存之控訴原則，檢察官節制法官權力之精神蕩然無存；且法院置於國防部之下，形同行政干涉司法，憲法第 80 條審判獨立之保障亦

被掏空殆盡。

(三) 又，就公開審理而言，軍事審判法雖規定：

第三十六條（軍事法庭之開庭）

軍事法庭開庭，於軍事法院內為之。但必要時，得在管轄區域內指定適當地方臨時開庭。

前項但書情形，於戰時上訴以提審或蒞審行言詞審理時準用之。

第三十七條（審判公開原則）「軍事法庭訴訟之辯論及裁判之宣示，應公開行之。但有妨害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危害證人生命、身體安全之虞時，得不予公開。軍事法庭不公開時，審判長應將不公開之理由宣示。前項情形，審判長仍得允許無妨礙之人旁聽。」

惟依上開條文，乍看之下似符合公開審理原則，實則軍事法院均設於營區內，一般人根本無法進入旁聽，故軍事法院之開庭，僅具公開之名，而行封閉審判之實，與釋字第 436 號解釋所要求，最低程度正當法律程序保障相去甚遠。

(四) 承上，平等原則要求國家就本質上相同之事物應相同對待，本質上不同事物不同對待，鈞院 歷來大法官釋字第 365、410 號均已解釋在案。本案聲請人王瑞豐及訴外人陳俊龍被控騎乘機車搶奪，一人適用軍法審判、一人適用普通司法審判，所得出一人有罪入獄，一人無罪之判決結果，何以致此？理由即如上述：軍事審判制度審檢不分立、審判不獨立、不公開，導

致該制度本身即為冤案、錯案之根源，如以江國慶案為例，吾人便可知情況之嚴重。倘若王瑞豐非軍人，其必能與陳俊龍同案受審判獨立、審檢分立、公開審判之普通法院審理，而終能獲得無罪判決。

(五)我國軍事審判法依王瑞豐軍人之身分，而對其所適用之審判程序為有異於同案民人陳俊龍之差別待遇，該待遇之別乃王瑞豐受行政審判(國防部)，而陳俊龍受司法審判。國家對此同案、可有相提並論性之兩人所為天差地別之待遇，是否有正當理由？答案仍為否定，蓋何以王瑞豐身為軍人即應受無法滿足低度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之軍法審判處罰，獲罪入獄，而陳俊龍受高度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之司法審判，無罪釋放？故聲請人王瑞豐所受之軍事審判法相關規定，應已牴觸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而違憲。

(六)原確定判決所適用之軍事審判法第 181 條第 5 項規定：

✓ 「當事人不服高等軍事法院宣告有期徒刑之上訴判決者，得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高等法院提起上訴。」

上開原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律，明白肯認聲請人受國防部高等軍事法院之合法性；然於本案中，聲請人雖依上開規定得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由，向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提起上訴，惟事實審法院(國防部南部地方軍事法院、國防部高等軍事法院高雄分院)既就事實部分判處聲請人有罪，普通法院僅能就適用法律部分審查，自不能「救濟」或「補正」事實審就認定事實部分之瑕疵，無從就事實部分更為認定；上開條文肯認聲請人應受軍事法院

事實審裁判，使得聲請人無法滿足低度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之軍法審判處罰，獲罪入獄，而同案被告陳俊龍受高度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之司法審判，無罪釋放，上開原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律應牴觸憲法第七條而違憲。

二、原確定判決所適用之軍事審判法第 181 條第 5 項之規定，牴觸憲法第 8 條人身自由權之保障，應違憲。

(一)憲法第 8 條的規定，拘束人身自由之處分都只能保留給法院裁決（法官保留原則），因此，鈞院於 1980 年做出釋字第 166 號解釋，表明警察官署並無拘束人身自由的裁決權，應由法院為之。1990 年，釋字第 251 號解釋再度重申本旨。因此也使得《社會秩序維護法》修正。根據目前社維法之規定，就算拘留一天也必須送法官裁決。隨後的釋字第 392 號解釋也表明，《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擁有羈押權違憲，只有法官有權決定是否羈押被告。檢警應於 24 小時內將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之人民移送法院提審。

(二)另司法院大法官曾於釋字第 639 號解釋理由書中闡明：「本院解釋固曾宣示人身自由為重要之基本人權，應受充分之保護，對人身自由之剝奪或限制尤應遵循正當法律程序之意旨（本院釋字第三八四號、第四三六號、第五六七號解釋參照），惟相關程序規範是否正當、合理，除考量憲法有無特別規定及所涉基本權之種類外，尚須視案件涉及之事物領域、侵害基本權

之強度與範圍、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有無替代程序及各項可能程序之成本等因素，綜合判斷而為個案認定。」

(二)因此，行政體系下，不管是警察、檢察官，依據憲法及大法官解釋之意旨，均沒有拘束人身自由的權力，荒謬的是，同樣是屬於行政體系的國防部，居然可以擁有判人生死、剝奪生命、自由的權力？倘若國防部軍法司之法官可以判人生死，那麼與普通法院法官通過一樣的考試、一樣的訓練所的法務部檢察官們，何以連擁有一天的羈押權都不行？故現行軍事審判制度，依鈞院上開解釋之意旨，實已抵觸憲法第八條人身自由權之規定。

(三)縱上，原確定判決所適用之軍事審判法第 181 條第 5 項之規定，已違反憲法第 8 法官保留原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應違憲。

三、原確定判決所適用之軍事審判法第 181 條第 5 項之規定，抵觸憲法第十六條訴訟權之保障，應違憲。

(一)按司法院大法官於司法院釋字第 482 號解釋之理由書指明所謂訴訟權，乃人民司法上之受益權，即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依法享有向法院提起適時審判之請求權，且包含聽審、公正程序、公開審判請求權及程序上之平等權等。復按釋字 582 號解釋理由書特別闡明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就刑事審判上之被告而言，應使其在對審制度下，依當事人對等原則，享有充分之防禦權，俾受公平審判之保障。許玉秀大法官更於該號解釋之協同意見書更進一步說明：「基於法治國之自主原

則，被告享有訴訟上之自主權，即作為訴訟主體之防禦權，諸如上述之緘默權（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第二款參照）、共同被告間之對質與詢問（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七條參照）、詰問證人之權利（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六條以下參照）、委任辯護人以加強防衛力量之權利（刑事訴訟法第二十七條以下參照），以及保全證據之權利（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十九條之一參照）等，皆能使被告於訴訟上與可以倚靠國家機器之原告—公訴機關，享有武器上之平等地位，而有受公平審判之機會。憲法上保障刑事被告之防禦權，即等同於保障其訴訟權，保障刑事被告之訴訟權，即等同於保障其於訴訟上與他造平等之權利地位。是以審查刑事被告之訴訟權是否受保障，亦等同於審查其訴訟平等權，而有平等原則之適用。

（二）本件聲請人王瑞豐所受軍法審判特殊之處即在於，被告、軍事檢察官、軍事審判官，其身分均為軍人，掛有軍階。聲請人王瑞豐軍階為一兵，然軍事檢察官、軍事審判官至少均為上尉以上軍官。則於上命下從，軍令如山，重視階級之軍事體系中，被告一兵王瑞豐，如何有可能與公訴機關軍事檢察官對等？如何可能有平等訴訟權，而有充分防禦，受公平審判之機會？

（三）故於此軍事審判程序中，被告與公訴機關嚴重不對等，被告百口莫辯，結構上已無抵抗公訴機關之機會，遭國家過度評價、甚至錯誤評價，也就不足為奇。於本案中更可看出，容許軍人審判，軍事審判制度存在之荒謬性。只要軍階存在，以當事人平等原則為核心之憲法上訴訟權，就不可能存在於軍事審判制度之中。軍事審判法第 181 條第 5 項之規定，牴觸憲法第十六條訴訟權之保障，應違憲。

四、原確定判決所適用之軍事審判法第 181 條第 5 項之規定，牴觸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一)按我國於民國 98 年 04 月 22 日所公布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下稱兩公約施行法），其中第二條已將兩公約規定具有國內法之效力，第 3 條更進一步規定適用兩公約時應參考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復按「人人在法院或法庭之前，悉屬平等。任何人受刑事控告或因其權利義務涉訟須予判定時，應有權受獨力無私知法定管轄法庭公正公開審問」此為 ICCPR 第 14 條規定，並與上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及武器平等原則若合符節。又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32 號一般性意見第 13 點進一步解釋 ICCPR 第 14 條規定為「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的權利，還保障訴訟方的權利平等」。

(二)軍事審判程序中，絕大部分被告均為如本案聲請人王瑞豐之義務役士兵，其與軍事檢察官上尉軍官以上對比，於講究軍階之軍事體系，猶如以卵擊石，豪無對抗之實力可言，尤其，倘若軍事檢察官為上校，軍事審判官為上尉，被告如本案之聲請人為一兵，審判官會如何做出判決，實不難預測。故軍事審判制度違反兩公約之規定，至為灼然。

叁、參考外國法經驗：軍刑法案件由普通法院審理

一、在參考外國法制上，德國並無軍事審判制度，所有犯軍刑法案件均由普通法院的軍事法庭審理。而在法國，軍中的人權保障自拿破崙以來就非常周到，全法國只有一個軍事法庭，負責審理法國軍人在外國之犯罪，其餘均由普通法院審理。

二、歐洲人權法院對軍中人權的保障更為周到，在 1995 年的 The UK v. Findlay

這個案子裡更明白指出，英國國防部對 Findlay 這個阿兵哥所為懲罰處分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之規定，即受處分人最低限度受公平聽審的權利。該案中 Findlay 受處分之聽證程序所組成人員，均由 Findlay 的長官所指派，「從一個理性的人的角度來看，這樣的聽證構造並沒有獨立於部隊指揮」，也因此導致英國通過軍隊訓練法修正案（the Armed Forces Discipline Act 2000），將懲罰處分之程序獨立於部隊之外，對於禁閉處分，部隊須於 48 小時內將受處分人送交法院裁決。因此，軍方連禁閉處分都必須受法院審查，以軍人審判，如我國軍事審判制度拘束人身自由或剝奪生命，殊難想像。

肆、廢除軍法審判，讓我國只有一種正義

一、縱上所述，本件聲請人王瑞豐與陳俊龍被控共騎一輛機車搶奪，何以王瑞豐被判五年徒刑含冤入獄服刑，而陳俊龍獲判無罪，還其清白？答案即是：軍事審判制度結構上即為冤案、錯案、假案製造之原因。審判不獨立、檢審不分立、訴訟不對等，在在使得公平審判與軍事審判制度絕緣。無怪乎，製造出江國慶案、王瑞豐案及不知還有多少悲慘的冤錯案。

二、由上述軍事審判制度違反憲法平等權、人身自由權、訴訟權之保障、亦與德國、法國軍事審判制度及歐洲人權法院案例有違可知，我國法治國的無漏洞法律保障在軍事審判這裡，著實的破了一個大洞，這也是導致江國慶

案、王瑞豐案的決定性因素。士兵只是穿著制服的公民，不表示軍方可以任意槍斃他的生命、拘束他的人身自由或其他自由權。

三、拿破崙於 200 年前的名言：「在法國只有一種正義，你首先是一個公民，其次才是一個士兵。」世界最偉大的將領之一、橫掃歐洲的拿破崙了解，只有徹底的關心士兵人權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只有貫徹軍中人權的國家，才值得士兵犧牲生命，為其奮戰。廢除軍事審判制度，讓犯軍刑法之罪的人可以在普通法院的軍事法庭受到公正的審判，應該是每一位為台灣付出寶貴青春的士兵，最基本也最卑微的權利。王瑞豐相較於陳俊龍，國家欠他一個公正的審判，故懇請 鈞院審酌，宣告軍事審判法第 181 條第 5 項及相關條文違憲失效，讓軍事審判制度走入歷史，並給予聲請人王瑞豐再審，提起冤獄賠償、還其清白之機會，為禱。

此 致

司 法 院

《所附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附件 1：王瑞豐歷審判決書影本乙件。

附件 2：陳俊龍歷審判決書影本乙件。

中 華 民 國 1 0 1 年 3 日

聲請人 王瑞豐

訴訟代理人 邱顯智律師

聲請大法官解釋委任狀

年度	字第	號	股別	股
姓名或名稱及 身分證字號及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住居所或營業所、 郵遞區號及電話號碼			
事務所地址、郵遞區號及電話號碼				
送件人姓名、住址、 郵遞區號及電話號碼				

茲因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聲請大法官解釋
事件，選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人。

評 狀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 公鑒

委任人：王瑞豐 

受任人：邱顯智律師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 日